

鲁迅与沈从文的尼采接受研究*

— 20年代文学经典化与尼采中国化为中心 —

高 建 惠**

— <目 次> —

- | | |
|-----------------------------------|------------------------------------|
| I. 1902~1908 : 鲁迅对尼采的理论
阐释 | III. 1918~1925 : 尼采的中国化与鲁
迅的经典化 |
| II. 1918~1925 : 鲁迅对尼采的本土
化文学实践 | IV. 从鲁迅到沈从文 : 尼采中国化的
拓展 |
| | V. 结论 |

20世纪初尼采是作为文学家被介绍到中国来的, 相对于哲学, 尼采在文学界的影响更大。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 也是尼采中国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有“中国的尼采”之称。20年代前半期鲁迅逐渐成为文学界的中心, 鲁迅文学地位的经典化与1918~1925年第一次“尼采热”, 即尼采中国化过程是相辅相成的。同时期,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位经典作家沈从文登上文坛, 但还只是边缘人物。20年代后半期所谓尼采热“退潮期”, 沈从文从新的视角延续、推动着尼采在现代文学中的影响, 拓展了“鲁迅尼采”的新境界。学界对于现代文学经典人物经典化过程和尼采中国化的关系考察尚不多见, 本文将尝试以这一新视角, 从鲁迅到沈从文, 从中心到边缘, 考察现代文学经典人物对尼采的中国阐释和接受。梳理出20世纪初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某种关系, 以及现代文学创作中尼采的接受和本土特征。

* 이 논문은 2020학년도 수원대학교 학술진흥연구비 지원에 의한 논문임.

** 수원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조교수.

I. 1902~1908：鲁迅对尼采的理论阐释

1. 作为外来资源的尼采

1902年春鲁迅考取官费留学到达日本东京。同年，因戊戌变法失败逃往日本的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两本刊物，并于10月16日《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介绍了尼采。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晚年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一文中回忆到：

鲁迅更广泛的与新书报相接触，乃是壬寅(一九〇二)年二月到了日本以后的事情。其时梁任公亡命日本，在横滨办《清议报》，后来继以《新民丛报》，风行一时……很能打动一般青年人的心，所以有很大的势力。癸卯(一九〇三)年三月鲁迅寄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¹⁾

对于鲁迅最早知道尼采的时间尚无定论，根据周作人的回忆我们可以推断，鲁迅初到日本通过梁启超等知道了尼采，途径是《新民丛报》上关于尼采的文章。²⁾周作人还介绍说东京时期的鲁迅多数时间沉浸在寻书、看书之中，以日文、德文为媒介积极与外来资源进行对话，这些外来资源最主要的就是尼采。³⁾鲁迅同乡和终身挚友许寿裳曾回忆鲁迅在弘文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日文书籍，内有“尼采的传”⁴⁾。

1904年9月鲁迅从东京到仙台学医，但一年半就放弃了，理由是著名的“幻灯片事件”。葛海庭在《20世纪日本汉学家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实证研

- 1)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72-73页。
- 2) 关于中国最早传播尼采的人，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在《尼采在中国(1918~1925)》，《国际汉学》2018年第2期中断定为梁启超。修斌在《梁启超的尼采认知及其“功利的启蒙”》，《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中认定为雨尘子。
- 3) 成芳，《尼采在中国》，南京出版社，1993，15页。
- 4)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4页。

究》一文中，较为完整地确认和还原了当年鲁迅“弃医从文”的历史事实。⁵⁾幻灯片中麻木的“看客”成为后来鲁迅文学作品中批判国民性的重要视角。这一事件同时促成鲁迅对梁启超和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反思，没有人性的觉醒，即使中国变成跟日本一样的强国，也无法摆脱兽性的一面。对个人主体性、个人意志的关注，让鲁迅走进最大的外来资源——尼采。

2. 鲁迅对尼采的本土化理论阐释

1907年和1908年，鲁迅完成了三篇重要文章——《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和《文化偏至论》。⁶⁾尼采的名字在这里第一次出现，《摩罗诗力说》3处，《文化偏至论》4处，《破恶声论》1处。有的直接引译尼采语录，有的间接转述尼采见解，有的条分缕析地描述尼采总体风貌、社会历史背景介绍、共时性的同代同类比较。鲁迅对尼采做了如下的阐释：

首先，鲁迅是从文学家的角度接受尼采。在《摩罗诗力说》中认为尼采和拜伦一样，是“摩罗诗人”的代表，他们的特点是强大的意志力和精神力量，富于反抗精神，反传统道德，拒斥庸众。并引译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的语录表现出少数觉悟者奋然上进的急切要求。

其次，鲁迅认为尼采是个人主义的英雄。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称赞尼采“若夫尼佉(尼采)，斯个人主义之雄杰者矣”⁷⁾。他借尼采的话提出，十九世纪的“偏至”就是只重物质，不重精神。尼采这些个人主义的英雄们，致力于的正是矫正十九世纪文明的“偏至”——“物质”主义和“众数”(庸众)思想，就此批评了中国占主流的“效西方以救中国”的谬论。

最后，认同尼采的“超人”思想，并提出“立人”的观点。要想矫正十九世

5) 葛海庭，《20世纪日本汉学家关于鲁迅“弃医从文”的实证研究》，《长江文艺评论》，2017。

6) 《摩罗诗力说》作于1907年，初发表于1908年2月3日《河南》月刊第二号和第三号；《文化偏至论》作于1907年，初发表于1908年8月《河南》月刊第七号；《破恶声论》初发表于1908年12月《河南》月刊第八号。

7)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4页。

纪的“偏至”，鲁迅认为只能通过个人主体性和个人意志的确立，即精神上“立人”才能实现，这样的人就是尼采所期待的“超人”。〈破恶声论〉首先提出善恶是非的标准应该在人性论的前提之下：凡合乎人性者，为合理的善举，否则即为“恶声”。那么什么是人性呢？人性之本在个人主观精神，即“心声”，“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⁸⁾即，通过具有个人主观精神的少数天才“超人”的觉醒，带动社会群体的觉醒。虽然鲁迅期望的“天才”与尼采“超人”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但二者理论上如出一辙。

3. 鲁迅对日本“尼采”的选择性接受

根据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先生的研究，我们知道鲁迅在日本时期日本思想界对尼采的理解大概有三种。第一，尼采主张国权论和反基督教。第二，尼采是极端个人主义者、反道德主义者、反对国家主义者。第三，尼采是本能主义者。⁹⁾鲁迅并不是全盘接收这些思想，而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状况，抱着改变愚弱的国民精神的强烈意愿，做出了自己独立的选择和判断。

首先，对于张扬国权论的尼采思想，鲁迅是不认可的。当时日本正处于国家主义上升时期，尼采的学说对张皇国力，鼓吹向外扩张有一定的作用。爱国主义者借此变成了倨傲的民族主义者，这在日俄战争的时候表现得尤甚。鲁迅对此在“幻灯片事件”中深有体会。在〈破恶声论〉中他说：“崇侵略者类有机，兽性其上也，最有奴子性，中国志士何隶乎？……虽哲人硕士，染秽恶焉。”¹⁰⁾认为崇尚侵略的强者属于“兽性”爱国的行列，与禽兽无异，同时提出哲人们也不免会受到污染，应该警醒。

其次，对于本能主义的尼采说，鲁迅也是不接受的。鲁迅抛弃了本能主

8)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7页。

9) (日)伊藤虎丸，徐江译，〈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文学评论》，1990，135-147页。

10)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3-34页。

义的观点,选择性的接受了对“物质主义”批判的观点。张钊贻认为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里阐述的观点与“日本的尼采”高山樗牛〈作为文明批评者的文学家〉一文中反对“物质主义”和“庸众”的观点相同。都希望借新兴的理想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通过文学与文化批评来完成对这些文化“偏至”现象的抨击等。¹¹⁾

最后,鲁迅向中国人传达的是英雄主义和文明批判者的尼采形象。也就是日本明治时期个人主义和反道德主义的尼采观,鲁迅选择了接受。伊藤虎丸认为鲁迅理解的“尼采”与明治日本的尼采有同时代性¹²⁾。鲁迅从尼采哲学接受的不是对立于组织的、个人的“本能主义”,而是“变革创造文学、思想、秩序、组织的人的主体性”。在他看来,鲁迅通过尼采“摄取到了欧洲近代文明的‘精髓’”,即主体性和个性尊严。¹³⁾这一点正是鲁迅尼采的本质。

日本时期是鲁迅接受尼采的第一次高潮期,尼采关于人的哲学深化了青年鲁迅关于人生问题的思考。他从救亡和启蒙的角度,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根本弊端在于个人主体性的缺乏,促使他提出“立人”的重要思想,开启了改造中国人国民性的新课题。即使现在看来,鲁迅的思想仍然是有意义的,体现了作为独立思考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超越时代性。尼采哲学可以说是鲁迅的理论基石。同时,鲁迅从一开始就把尼采作为同拜伦一样的文学家看待,采取了从道德或宗教的角度来讨论研究的方法,这也确立了中国接受尼采的基本方向,奠定了中国接受尼采的基础。

11) (澳)张钊贻,〈早期鲁迅的尼采考〉,载郅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三联书店,2001,858页。

12) (日)伊藤虎丸住,徐江译,〈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文学评论》1期,1990,137-138页。

13) (日)伊藤虎丸著,孙猛译,《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65页。

II. 1918~1925：鲁迅对尼采的本土化文学实践

鲁迅接受尼采的第二个高潮是在五四前后，1917年回国多年的鲁迅在钱玄同的邀请下加入《新青年》，1918年创作出第一篇白话现代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5月15日4卷5号的《新青年》月刊上。

1. 《狂人日记》中国尼采模式的开拓

《狂人日记》在内容、形式上都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而与世界文学接轨，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新文学的诞生。同时也是鲁迅对尼采思想的第一次文学尝试，中国最早的尼采思想中国文学本土化实践。作品中的尼采思想基本延续了早期日本时期对尼采的认识。首先，“超人”思想和“超人”形象。主人公“狂人”形象是一个具有“尼采”超人气质的人物形象，这一点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有说明：

“一八八三年顷，尼采也早借了苏鲁支(查拉图斯特拉)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¹⁴⁾

可见，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借用了俄罗斯作家果戈里《狂人日记》的外壳，装入了尼采超人的思想，而且更具有中国现实性。尼采说，任何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几乎全由疯狂替这种思想开导先路，打破习惯与迷信的陈规。”¹⁵⁾查拉斯图特拉到市场去宣讲超人哲学时，周围群众也把他看成可笑可恶的“疯人”。但“狂人”不是真的疯子，而是时代的觉醒者，他具有非常敏锐的

14)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转引自闵抗生，〈《狂人日记》中尼采的声音〉，《鲁迅研究动态》3期，1986，11页。

15) (德)尼采著，田立年译，《朝霞》，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52页。

洞察力和穿透力，发现了封建专制社会的本质——“吃人”。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¹⁶⁾

狂人尖锐而准确地击中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非人性的要害所在，认识到中国封建礼教压抑并扼杀人的本性，从而想到要发起拯救，这是他逐步觉醒走向个性主义的标志。

第二，人性观念和“真的人”。鲁迅早期提出善恶的评判标准是是否符合人性。狂人努力劝转身边人为善，不要“吃人”，就出于人性善的意识。先是想人们对“吃人”现象的不合理性表示怀疑，再是想从人类进化的角度让人自觉抵制堕落而变为“真的人”，最后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描述了不进行意识转变的可怕后果：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¹⁷⁾

“真的人”是与虫子、野蛮人相对而言的，出自尼采，指最具有人性的人。在鲁迅看来，“真的人”和“超人”一样，是人性发展的最高阶段上一种理想的人类状态。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3节中表达了人类不断发展和超越的观点，“如今，一切生物都创造了某种超越自身的东西。……对人而言，猴子是什么？只不过是一种可笑的动物或一种痛苦的羞耻而已。对于超人而言，人也只能是一种可笑之物或一种痛苦的羞耻。”¹⁸⁾鲁迅在《中国新文学

16) 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页。

17) 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4页。

18) (德)尼采著，黄明嘉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漓江出版社，2000，6页。

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引述了这段话，这一观点与“狂人”的认识完全相同，而且与他在规劝别人不要再“吃人”时说的话也相似。¹⁹⁾

第三，重估一切价值。“重估一切价值”是尼采的核心思想之一，他把道德价值视为最高价值，谴责基督教是“人性的欠缺”，是一种和生命相敌对的伦理。鲁迅则在《狂人日记》中大胆地指出了封建礼教非人性的本质，努力唤醒众人起来质疑、反抗。狂人问：“吃人的事，对么？”得到的回答是：“从来如此。”狂人的发问是对以往价值秩序的质疑，也是对置身在非人性文化传统中的生存方式的质疑，表现出反抗的勇气。狂人的勇气，还在于对于自身的质疑。“吃人的是我的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²⁰⁾发现自己也无意却先天地加入了“吃人者”的行列，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和罪恶感，意识到启蒙和反叛的紧急和必要性，发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²¹⁾的呼喊。

第四，永久循环。《狂人日记》中封建礼教“吃人”不是发生在个别家族和村庄的偶然事件，而是古老的中华民族蓄积多年的“祖传老病”，“从来如此”。每一个人都是吃人者，也是被吃者，所有的人都身在其中，世世代代循环反复，人人在劫难逃。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57章中说，人类的“存在”，自来受制于“永久循环的因果律”，认为欧洲文明就是永久循环。²²⁾鲁迅认识到中国历史本质上也是封建礼教的大循环，《狂人日记》刻画的就是这样一幅“永久循环”着的“食人民族”的风俗画²³⁾。

第五，批判国民性与末人形象。鲁迅在日本早期论文中对物质主义的“庸众”思想提出过批判，在《狂人日记》中也塑造了一批具有庸众思想的“末人”(the last men)形象。在尼采的哲学中，“末人”是和“超人”、“真的人”相对立的形象，尼采深痛厌恶“末人”身上的这种奴隶性。²⁴⁾日本时期“幻灯片事件”中

19)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29页。

20) 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7页。

21) 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5—16页。

22) (德)尼采著，黄明嘉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漓江出版社，2000，256页。

23) 闵抗生，《〈狂人日记〉中尼采的声音》，《鲁迅研究动态》，1986，12页。

“看客”让鲁迅看到了国民性中“庸众”和“末人”的特征。《狂人日记》中也表现了这些“看客”的“末人”性格：赵贵翁的眼色“似乎想害我”，前面一伙小孩子，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眼睛却看着我，说要咬我几口”。这些“看客”中有被知县打过的，有被绅士掌过嘴的，还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父母被债主逼死的，本身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们自己被人凌辱，也凌辱别人，自己被人“吃”，也“吃”别人，精神上极其愚昧、无知、麻木。²⁴⁾

《狂人日记》是鲁迅日本早期尼采思想理论阐释的文学本土实践，尼采不仅为作品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从人物语言、到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设计，一直到思想内涵，都是对尼采的中国化阐释，开拓了一种鲁迅“尼采”文学模式。这部小说可以说是鲁迅全部作品的一个总纲领性作品，鲁迅后面的小说基本没有脱离《狂人日记》的“尼采”模式。

2. 鲁迅“尼采”模式的延续和发展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边在“随感录”中继续推介尼采，一边到1925年前一连创作了二十多篇小说，延续和发展尼采模式。首先从“超人”形象来看。“超人”是尼采对人的一种生命理想，鲁迅把这一理想化、哲学化的概念现实化、中国形象化，他们是觉醒者、先驱者、革命者，或者启蒙主义者，本质上传达的仍然是尼采的道德和价值观。《长明灯》中四爷的侄子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被视为“疯子”，因为他想尽办法要熄灭社庙里的长明灯，即使被捆绑起来，仍口口声声地狂喊要烧掉社庙，展现出了比“狂人”更坚定、更有勇气、更富有行动力的反抗精神。这些人同时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受挫、失败，如《在酒楼上》吕纬甫、《孤独者》魏连殳、《伤逝》子君

24) (德)尼采著，张念东、凌素心译，《看哪这人—尼采自述》，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53页。

25) 王学谦，〈来自生命深处的呐喊—论《狂人日记》的生命意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50页。

和涓生等，作为时代的叛逆者，在情感上无一例外都感到“孤寂和悲哀”。黄怀军在博士论文中将鲁迅塑造的尼采式“超人”称为“准超人”²⁶⁾，认为这些人物与尼采“超人”仍有距离。本人认为其距离源于鲁迅对他们的中国化处理，这些人物都是中国化了的，具有精神反叛特点的“超人”。

鲁迅的中国式“尼采超人”面临的失败和绝望，来源于鲁迅对启蒙之艰难的深刻体验，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具有个体精神的人都会遭到诟病。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就曾说过，“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溢，与民贼同。”²⁷⁾尼采把人生的真理分为善与恶、绝望与希望的两面，生命的悲观被尼采看成是一种悲壮，这种悲壮感把绝望化解在希望之中，给生存提供了无限生命力。鲁迅自身作为先驱者，感到了尼采“超人”的悲哀，但还是充满希望，坚定地相信它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方向。“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²⁸⁾可见，尼采思想也为鲁迅的“超人”提供了希望和生命力。

关于“末人”和“庸众”的形象，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部分。²⁹⁾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建立在尼采对现代人，尤其是德国民族的劣根性的批判上，经过鲁迅的中国阐释赋予了新的概念化意义。鲁迅笔下的“末人”不单具有尼采“末人”的特点，指那些只追求个人幸福而不追求人类伟大精神思想事业的人，而且指具有中国特征——精神退化、平庸无趣、没有生活目标、麻木而愚昧的民众。他笔下的《故乡》中闰土、《药》中华老栓父子、《祝福》

26) 黄怀军，《中国现代作家与尼采》，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7，51页。

27)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85-186页。

28) 鲁迅，〈随感录·四十一〉，《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5页。

29) 鲁迅在日本时期就一直关注国民性问题。据考察，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rthur H. Smith)1872年来华传教，在上海刊发了《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1896年被翻译为日译本《支那人气质》出版，对西方世界影响非常大。1926年7月2日，鲁迅在东单买到日本人安冈秀夫著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直在思考这本书的内容。这两本书都对鲁迅有所影响。参考，杨联芬，〈晚清与五四文学的国民性焦虑(三)〉，《鲁迅研究月刊》12期，2003。

中祥林嫂,《阿Q正传》中的阿Q,还有那些“看客”们都是典型的“末人”。

鲁迅把“末人”这个概念带到了现代汉语之中。“末人”之所以存在并且长久不衰,究其根本原因是封建制度已经根深蒂固地活在人们的思想中,构筑成长期禁锢人们思想和灵魂的精神牢笼。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他看到精神匮乏是中国人性格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意识到“末人”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给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于是,鲁迅在他的小说中把“末人”的形象揭示给人们看,不动声色地表现出“末人”的存在给民族带来的危害和痛苦。这再次证明了鲁迅在日本时期只有通过“改造国民性”、“立人”、拯救人的精神和灵魂,才能改变中国的论点。

从鲁迅的“尼采”文学实践来看,鲁迅对尼采的中国阐释仍是在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特点。³⁰⁾同时也可以看到,鲁迅和尼采在寻找解救中国民众灵魂良药时找到了契合点,鲁迅开拓的“尼采”文学模式深化了当时中国学界仅仅把尼采作为西方文化符号的简单片面理解,推动了1918~1925年第一次“尼采热”。同时,这一“尼采”文学模式对鲁迅周围的作家,甚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三章详述。

3. 散文诗集《野草》：中国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狂人日记》之后,二十多篇小说的刊发,鲁迅把尼采哲学思想引入救国存亡的中国社会实践中。鲁迅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思想也达到了成熟的阶段。成熟时期的鲁迅将在东京时期的尼采的理解内在化了,这种内在化除了表现在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直观构架以外,还表现在鲁迅的精神人格上,这种尼采式的鲁迅人格在散文集《野草》中得到展示。

《野草》的写作时代,是五四运动退潮后最黑暗的时代。新文化运动以

30) 고건혜, <중국현대문학에서의 니체 수용 연구-현대성과 현대문학의 발생에 중심으로>, 《니체연구》 37권, 2020.

及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分道扬镳。鲁迅作为五四运动的开路先锋，感受到了孤独与落寞。尼采曾经这样表达过自己的创作，“我的书有丰富的心理经验”³¹⁾，《野草》也是鲁迅在压抑痛苦的时期，自己内心的独白。《野草》虽然篇幅比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短小，但其中的精神气质与查拉图斯特拉如出一辙，可以说是中国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两部作品的很多篇章都是对应的，如《影的告别》与《影子》构思上的一致，《死火》与《在橄榄山上》、《墓碣文》与《墓歌》在意境上的相似。作品结构也相似，语言都是诗化方式。从创作手法上来说，都使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很多意象和比喻都来自尼采。美学风格上，都具有深沉悲郁之美。鲁迅内在精神的“尼采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反抗绝望、孤军奋战的精神。《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影子》表述了“影子”拼命追赶查拉图斯特拉，而查拉图斯特拉要甩脱“影子”的情节。鲁迅《影的告别》中则借“影子”的意象，反其道而用之。影子主动向“昏睡者”告别，表现了处于孤独之中鲁迅重新寻求新希望的勇气。②“超人”的强力意志。《秋夜》中从枣树的孤独、沉默、受伤、抵抗，都可以感到一种尼采“坚强的意志”的力量，鲁迅称它们为“英雄们”，并向它们致敬。③对庸众、奴隶、末人的排斥。《求乞者》出于对精神弱者的排斥，对向“我”求乞者表现出厌恶之情。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的10个小节和《查》第67章都提出反对求乞的观点。尼采的道德观中，同情和怜悯只能培养出“奴隶道德”，一个生命意志强烈的个体，不该依靠求乞获得生存下去的可能性。④重估一切价值的质疑和内省精神。重估一切价值的反抗和质疑，同时伴随着对自身的内省，是鲁迅和尼采最为突出的心理特征，也是《野草》和《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说》最为深刻的思想主题。《墓碣文》写“我”与一个死者的灵魂相遇问答，闵抗生认为，这是鲁迅与自己灵魂的对话。是在他陷入虚无主义和精神苦闷之时，对自己精神世界的质疑和自我解剖。³²⁾查拉图斯特拉坚定地断言，“哪里有坟墓，哪里就有新生。”³³⁾《墓碣文》

31) (澳)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89页，转引。

32) 闵抗生，《〈墓碣文〉与《Also Sprach Zarathustra》》，《扬州师院学报》4期，

中死尸也对自己化“成尘”报以“微笑”，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情绪。^⑤永久轮回和个人主体精神的确立。《过客》中老翁劝阻“过客”前行的情节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2节相似。“走”是《过客》中的重要意象，是“过客”生命本源和存在方式，也是鲁迅对世界本源的理解。永不停息的“走”是“永久轮回”世界的存在方式，也是查拉图斯特拉形象的核心所在。某种程度上《野草》就是一部关于“走”的诗学。³⁴⁾鲁迅把自己也看做一个不断行走的“过客”，“过客”的精神气质具有尼采“超人”的特征，也是鲁迅内在精神世界的表现。

《野草》与《查》的关系显而易见，1936年君度在讨论梵澄的译作《苏鲁支语录》(《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突然说到，“我想起鲁迅先生的《野草》。”³⁵⁾很多研究者发现，鲁迅有关尼采的绝大部分表述也都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依托，并不超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范围，尤其是其中的《序言》部分。³⁶⁾张钊贻认为，“事实上，尼采通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找到自己哲学思想的最佳表达方式。因此，尽管鲁迅没有读过很多尼采的著作，但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就接触到了尼采的主要思想。”³⁷⁾尼采思想是青年鲁迅思想的发源所在，也是中年鲁迅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钥匙所在。在人生的迷茫期，鲁迅在对人生意义的哲学探讨中，再次与尼采达成一致。鲁迅内在精神尼采化，并获得“超人”一样的精神力量，鲁迅“中国的尼采”的形象逐渐得到认知。下面我们将对此过程及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进行详述。

1989。

- 33) (德)尼采著，黄明嘉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漓江出版社，2000，121页。
- 34) 宋夜雨，〈“后五四”的鲁迅与《野草》的写作缘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7期，2021，123页。
- 35) 君度，〈关于《苏鲁支语录》〉，郜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三联书店，2001，232页。
- 36) 郜元宝，〈“末人”时代忆“超人”——“鲁迅与尼采”六题议〉，《同济大学学报》1期，2015。
- 万军，〈简论尼采对鲁迅的影响〉，《绍兴文理学院学报》9期，1997。
- 钱碧湘，〈鲁迅与尼采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期，1982。等等。
- 37) (澳)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79页。

III. 1918~1925：尼采的中国化与鲁迅的经典化

1918~1925是第一次中国“尼采热”的时期，也是鲁迅从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登上文坛，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的时期。鲁迅的中国尼采文学实践，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从不被认可到被广泛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次，这个过程让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学作家的形象逐渐经典化，中国对尼采的认知也从文化符号深入到思想，接受范围从少数海外留学作家深入到普通本土作家。最后，中国本土尼采认知的深化，反过来，又使鲁迅“中国的尼采”形象成为学界共识，可见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

1. 新文化空间的拓展和鲁迅的经典化

鲁迅在创作新文学作品之前，在日本的三篇论文，并没有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回国以后，1918年代表新文学开山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狂人日记》，也没有像一声惊雷一样，震惊文学界。当时的情形，如鲁迅自己所说“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所感到者也只有“寂寞”。³⁸⁾周达摩在1931年《中国新文学演进之鸟瞰》中也叙述了当时的情况，“民国八九年时……此时文坛，几全以冰心为偶像……在此冰心势力范围之下，有唯一成功之作者突起文坛，然为大众所不识。此人即鲁迅氏……”³⁹⁾

当时，作为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新青年》杂志的情况大致相同，鲁迅受钱玄同之邀加入《新青年》杂志时，《新青年》的情况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文学评论家许杰经历了那个时代，

38)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9页。

39) 周达摩，《中国新文学演进之鸟瞰》，《国文周报》第8卷第5期，1931年1月26日。

他说,

《狂人日记》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到,我也不知道它的内容。到了第二年五月,我才知道有所谓“五四运动”……到了这一年暑假以后,我们学校的老师,给我们买了一批新出版的刊物,这里面就有《新青年》杂志。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理解这篇《狂人日记》所包含的重大意义。⁴⁰⁾

五四是中国新文化和传统封建旧文化的分水岭,新文化运动虽然在历史纪年表上已经发生,但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还没有形成具有新文学思想的接受群体,中国此时处于一个文化断层期。在这个断层期,读者和文化界延续的是中国儒教传统中温柔端正的文学风格,比如当时流行的冰心的文学就以恬淡清新而著称。鲁迅现代新文学作品中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叛逆反抗思想,阴冷、孤寂、绝望的情绪,很难为普通民众所接受。1923年茅盾在评论《狂人日记》的时候,反复给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新奇古怪”⁴¹⁾。当时读者对这种格式特别的作品普遍不能充分理解和欣赏,作品中包含的尼采思想更无法得到理解,尼采思想的传播事实上仍然局限在少数留学归来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中间。

《新青年》的寂寞,也就是新文化的寂寞,也是鲁迅和尼采的寂寞。这一文化断层随着《新青年》读者的增加,《新青年》作者和读者群的形成,特别是尼采的深入传播和鲁迅的经典化逐渐得到弥合。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影响逐渐扩大,《新青年》杂志的销量大增。⁴²⁾新文学的社会认同不断提高,空间不断扩大,能够接受新文学的读者群也从海外留学精

40) 许杰,《重读鲁迅先生的〈狂人口记〉》,《学术研究》5期,1979。张钰,《重回历史现场—从接受视角重新认识〈狂人日记〉》,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9页,再引用。

41) 茅盾,《读〈呐喊〉》,《文学》(周报)第91期,1923年10月18日。

42) 李宗刚,《〈新青年〉编辑约稿与鲁迅现代小说的诞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86页。

英，到北大师生、外省学生，再到外省青年，一步一步逐步扩大。⁴³⁾鲁迅的价值得以被发现，到1923年小说集《呐喊》出版的时候，鲁迅的影响已经不同以往，逐渐成为新文学运动中的热点和经典人物。“在杂志上，只要登着鲁迅先生的文章，销路就可以保险。只要有两种鲁迅先生的书，开起书店来就总可以发达”。⁴⁴⁾鲁迅生命后期创作的作品一经刊出，立刻导致刊物脱销，⁴⁵⁾可见鲁迅之“热”。

鲁迅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国内，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多个国家流传，成为享誉海内外代表新文学运动的经典作家。⁴⁶⁾他还参与发起，并与多个新文化社团保持密切联系。参与文学社团的出版、编辑工作，大力提携“新青年”们，以至于被称作是“青年导师”、“思想权威”。关于鲁迅在青年中的地位，1924年《语丝》周刊上发表的〈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篇文章，可以看到鲁迅当时的影响力。这个时期同样是尼采中国化的形成时期，鲁迅作为具有尼采思想的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其作品中的“尼采”思想就在这个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尼采”的西方文化符号形象得到更广泛认知，中国本土对尼采的理解逐渐加深，鲁迅成为这一时期推动尼采中国化最有力的本土实践者。

2. 尼采热与鲁迅“中国的尼采”认知形成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尼采已经为中国人所知，但是范围很小，有局限

43) 左轶凡，〈作为燃料的青春及其表达—《新青年》杂志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4，77-115页。

44) 许钦文，〈鲁迅先生与新书业〉，《青年界》第10卷第4期，1936年11月。

45) 李金龙、卢妙清，〈鲁迅编辑实践之历史评价与再认识〉，《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8期，2018，91页。

46) (韩)朴宰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鲁迅研究月刊》4期，2005。
(日)丸山升著，靳丛林译，〈日本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月刊》11期，2000。
张杰，〈美国的鲁迅研究〉，《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4期，1986。
范劲，〈鲁迅研究在德国〉，《文艺研究》1期，2018。等等。

性。雨尘子、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介绍和鲁迅在《河南》上对尼采的阐释都局限在日本华人留学生圈层中。这时中国本土有王国维的尼采介绍,但由于其专注于纯学术研究,而且对新文化运动持不认可的态度,⁴⁷⁾影响仍然不够广泛。真正让尼采在中国成为热点的是围绕在《新青年》周围的新文化运动支持者们,经过这些人物的频繁征引和反复论说,尼采在新派知识圈里逐渐广为人知。但新文化运动者们多出于“实用性”和“功利性”的目的,对于尼采的介绍仍局限于一个反传统、反封建,代表西方文化的文化符号,理解的深度不够。直到1918年鲁迅《狂人日记》发表,虽然仍不脱离“功利性”的目的,但鲁迅把尼采哲学思想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人物文学形象化,赋予标语化、口号化的尼采以血肉和躯体,开始点燃中国“尼采热”的导火索。可以说经过鲁迅的文学阐释,尼采才真正落地中国,深入人心。

为了更好地阐发尼采思想,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的同时用文言翻译了《查拉图斯特拉的序言》前3段。同年11月15日《新青年》5卷5号《渡河与引路》一文中鲁迅将耶稣和尼采在“见车要翻了”的问题上的两种不同主张拿来对比,坚决表示自己更倾向于认同尼采。⁴⁸⁾1920年,鲁迅将《查》序言的10节全部翻译出来,这次用的是白话文翻译。以笔名“唐俟”发表在《新潮》第2卷第5期(1920年9月1日)上。译文后面还附了一篇“附记”,鲁迅首先简要介绍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特点,然后把全序每一节加以解释,逐节归纳该序言的思想内容,并对其中一些“含有意思的名词和隐晦的句子”作了简明的解释与辨析。鲁迅这篇“附记”是他一生中讨论尼采学说最集中、篇幅最长的文字,深化了学界对于尼采思想的接受和影响。

这一期间,鲁迅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批短小精悍、针砭时弊的杂文。这些杂文和之后的一些文章一共41篇结集成《热风》,由北京北新书局于1925年11月出版。其中多次对尼采话语的引用和对尼采思想的阐发,当时学界推他的《热风》为最具“尼采风”的杂感集,徐志摩公开宣称当时文学界

47) 周帅,《王国维与新文化运动》,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4。

48) 李林荣,《鲁迅“尼采”的踪迹及意蕴—以鲁迅杂文的历时性细读为中心》,《山东社会科学》8期,2013,74页。

鲁迅被称为“中国的尼采”⁴⁹⁾。《彷徨》是鲁迅《呐喊》之后的第二部小说集，收1924至1925年所作小说十一篇。在回忆自己此时的思想和写作活动时，鲁迅说：“我的‘彷徨’并不用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儿读过尼采《Zarathustra》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于是也就决定，还是照旧投稿。”⁵⁰⁾所谓“余波”是指译介《查拉图斯特拉序言》所受到的思想影响，把写作比作做成“炸药”的说法，则借用了尼采“我是炸药”的说法。可见，鲁迅对于自己思想中的尼采因素，以及作为“中国尼采”的形象认知是认同的。

还有一件轶事为我们留下了鲁迅作为“中国尼采”形象的证明。1926年鲁迅应林语堂之邀赴厦门大学任教，社会及学校的腐败使鲁迅愤然离去。为表示对鲁迅决绝态度的赞赏，1927年林语堂作了《译尼采论〈走过去〉送鲁迅离厦门大学》为鲁迅壮行。林译尼采《走过去》，反映出友人对鲁迅身上“尼采”精神的敬佩。⁵¹⁾

3. 鲁迅“尼采”影响的扩散

鲁迅开拓的“尼采文学”模式，随着鲁迅在现代新文学领域地位的不断上升，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得到借鉴和模仿。现代文学中的尼采表达不断得到扩散，尼采在中国的理解也不断得到深入发展。从鲁迅周边人物来看，向培良和林语堂都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反对封建道德礼教、“末人”和庸众的批判等。受过鲁迅提携的青年向培良长篇小说《我离开十字街头》散发出浓郁“尼

49) “鲁迅先生的作品，……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徐志摩，〈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也引述了这段话。

50) 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转引自程致中，〈鲁迅前期小说与尼采〉，《人文杂志》5期，1989，106页。

51) 闵抗生，〈〈过客〉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124页。

采味”。小说的主人公对北京城的批判，让鲁迅“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⁵²⁾为鲁迅离开厦门壮行翻译了尼采《走过去》的林语堂，为了弘扬尼采的“健全的作战精神”而创作了系列散文《萨天师语录》，通过Zarathustra的北京见闻，批判了“末人”和庸众思想，揭露了道德礼教的僵死、病态与浅薄。

除此以外，还有白采、高长虹、郁达夫对“超人”形象的塑造。白采的诗《赢疾者的爱》和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中《时间里的过客》，与鲁迅的《过客》情节一样，都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2节的翻版，主人公都是集“孤独者”、“漂泊者”与“反叛者”于一身的形象。《赢疾者的爱》中主人公自称“我只是狂人哲学者的弟子”⁵³⁾，指明自己来自尼采。高长虹也是一位受到鲁迅提携的“新青年”，行文句式被鲁迅称为“尼采式的短句”。⁵⁴⁾鲁迅说“他很能做文章，……受了尼采的作品的的影响”。⁵⁵⁾高长虹的《狂飙之歌》是鲁迅之后又一部“中国的查拉图斯特拉”。这首诗不管是从情节构思，还是从人物形象，都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响。郁达夫比鲁迅小15岁，二人却是挚友。郁达夫曾翻译过尼采的作品，他对尼采的评价与鲁迅相似。⁵⁶⁾1921年的小说《沉沦》主人公孤独中最大的安慰就是“尼采”。⁵⁷⁾小说中，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超人”一般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孤独、苦闷的情绪都与鲁迅有相似之处。在山中遇见农夫的情节，更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情形的翻版。⁵⁸⁾

另外，20年代鲁迅支持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都与鲁迅有或多或少的交往。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在文学创作上的尼采书写不多，但对尼采学说

52)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4-15页。

53) 白采,《赢疾者的爱》,载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288页。

54) 鲁迅,《“寻开心”》,《鲁迅全集》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71页。

55) 鲁迅,《两地书·一七》,《鲁迅全集》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3页。

56) 郁达夫,《静的文艺作品》,《郁达夫文集》6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209页。

57) 郁达夫,《沉沦》,《郁达夫文集》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21页。

58) 黄怀军,《中国现代作家与尼采》,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7。

的翻译研究却相当深入，茅盾、郑振铎、李石岑、王统照等都把尼采作为文学家看待，这与鲁迅相同。可见，鲁迅对尼采的阐释，以及鲁迅开拓的“尼采”文学模式成为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家们的“时代共识”。

IV. 从鲁迅到沈从文：尼采中国化的拓展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普遍认为尼采“退潮”，这时中国另一位现代文学大家沈从文登上文坛，并逐渐成为继鲁迅之后又一位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沈从文虽然与鲁迅没有直接关联，却在中国第一次“尼采热”退潮期，以一个“边缘”人物从一个新的视角进入尼采。重新确立了新的“中国尼采”模式，拓展了现代文学中“鲁迅尼采”的表现领域，深化了尼采在中国文学中的影响。

1. 沈从文“尼采”的时代“共识”

第一，文学家尼采。关于沈从文与尼采的关系学界研究比较少，是一个待开发的领域。沈从文对于尼采中国化的研究却不是一个或有或无的存在，相对于其他局限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们，沈从文在尼采中国化的过程中具有突破性的作用。沈从文比鲁迅小15岁，鲁迅已经成为文学界的热点的时候，沈从文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与鲁迅没有直接的接触，而且二人的文学风格迥异，但沈从文承认自己的创作同样是受过尼采影响的。在〈我的学习〉中，沈从文曾说：“我二十岁以前……思想形式更容易与个人情感结合。不是马克思条理谨严的，为人类社会的新设计。却是个人中心的纪德、尼采一流一些断片印象感想。”⁵⁹⁾1923年沈从文常常去北京大学旁听，“青年学生多数兴趣正集中在尼采、拜伦、哥德、卢梭、果戈里”，并且“以为是尼采，或别的什么大诗人大文学家本人”。⁶⁰⁾在此，沈从文将尼采与拜伦、歌

59) 沈从文，〈我的学习〉，《沈从文全集》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62页。

德、卢梭、果戈里等诗人、小说家并提，明确称他是“大诗人大文学家”，表明沈从文对尼采最初的认识是“文学家尼采”。这一认识符合20年代中国对尼采认识的“共识”。

第二，“末人”和个人主体精神。当时关于尼采的“共识”，如“超人”说、“重估一切价值”主张，鲁迅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等观点，沈从文都是认可的，并且自觉地在文学中加以实践。1951年11月14日上海《大公报》上，沈从文提到自己早期创作一直“守住一个尼采式的夸大而孤立的原则，即脆弱文字将动摇这个虽若十分顽固，其实并不坚固的旧世界，更能鼓励年青一代重造一个完满合理的新世界”。⁶¹⁾鲁迅因为看了杀人的“幻灯片”而决定弃医从文，在小说中以“看客”的视角诠释了中国“末人”们的精神世界。沈从文也在多篇小说中表现了“杀人”场景，同样以“看客”的视角揭露了“末人”们的愚昧麻木，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新与旧》中杨金标重操刽子手旧业不可一世，折射出其奴性病态之严重。“全县城军民各界”的“看客”们面对革命夫妻被砍头没有丝毫的同情，反而觉得刽子手刀法精彩，大有前途。《巧秀与冬生》中的族长提议将“越轨”的巧秀妈沉潭处置，族中人们不加思索一致通过，把她“剥个净光”，“一面无耻放肆地欣赏那个光鲜的年轻肉体，一面还狠狠骂女人无耻”，看着她被推入深潭中活活溺死。而被害者面对如此残忍的惩罚，竟然也没有丝毫的反抗。沈从文在《中国人的病》中说，“中国人的病，是在封建专制和封建文化的统治下，缺乏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的主体精神。中国人只是在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⁶²⁾关于中国人缺乏主体精神的评价，与鲁迅对尼采的中国化阐释相符，也是当时尼采认识的“共识”。

第三，孤独主义和“永久轮回”。沈从文的尼采认知还有一点体现了时代

60) 沈从文，〈无从毕业的学校〉，《沈从文全集》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15页。

61) 沈从文，〈我的学习〉，《沈从文全集》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66-367页。

62) 沈从文，〈中国人的病〉，《沈从文全集》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87-89页。

共识，那就是认为尼采的“超人”说包括“孤立主义”或“个人中心”等内涵。在写〈我的分析兼检讨〉一文中，沈从文说：“这种孤立主义……和哲学结合，会成为尼采哲学。”⁶³⁾换言之，在沈从文看来，“尼采哲学”提倡“孤立主义”。沈从文长期生活在湘西，1922年只身来到北京后，一直难以融入都市生活，自称“乡下人”。作品中也弥漫着“孤独”的气氛，《柏子》中孤独的水手——柏子，《萧萧》中十二岁作为童养媳的萧萧，《边城》中被隔离在茶峒之外的翠翠和爷爷等，从作者本人到小说人物无一例外是孤独人群。

但沈从文从精神独立的角度上，对孤独主义是抱肯定态度的。“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⁶⁴⁾知识分子必须保持适度的“孤独”，方可获得独立的思考和深刻的认识。这与尼采相似，除了在大学做了十年教授之外，尼采一生大都在人类社会的体制之外游荡。他曾经谈及“孤独”说：“我所以隐退到孤独之中，就是为了不从众人饮水的水池饮水。当我生活在人群中，我的生活恰如他们的生活，我的思想也不像是我自己的思想……”⁶⁵⁾

沈从文笔下孤独的人物还都有着永久循环的特征，《边城》中不仅人物重复循环，人物命运、作品结构、世界认知，甚至表现手法都是不断重复循环的。翠翠从外貌到性格都像极了妈妈，老船夫也隐隐地感到，翠翠的命运也像极了她的母亲。翠翠和妈妈的经历是相同的，爱情同样是悲剧。女人如此，作品中的男人也是重复循环的，老船夫、杨马兵、翠翠爷爷、顺顺都是军人出身。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的命运是追求翠翠妈妈两个男人命运的重复，同时也是顺顺自己命运的重演。⁶⁶⁾

63) 沈从文，〈我的分析兼检讨〉，《沈从文全集》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70页。

64) 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全集》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06页。

65) (德)尼采著，田立年译，《朝霞》，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363页。

66) 高建惠，〈《边城》与《城堡》文本含混性对比研究〉，《中国语文学》70辑，2016。

2. 沈从文对尼采阐释的推进

一方面,沈从文“尼采”有时代“共识”性,另一方面,又突破了中国的尼采“共识”,在都市“末人”、生命力“超人”、艺术和审美几个方面重新确立了新的“中国尼采”模式,深化、推进了中国尼采的认识。

第一,都市“末人”和对现代文明批判的推进。沈从文的小说主要包括两类内容:一是原始传统的乡土生活,二是现代文明下的都市生活。乡土小说是在鲁迅的开创和带动下形成的一股持久的文学潮流,具有强烈的改造农业社会国民劣根性的使命感和鲁迅式启蒙主义特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有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同时还有对少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乡间人性美的赞美,可以说是对乡土小说的突破和开拓,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详述。第二类表现都市生活的作品,打开了现代文学的新局面,扩展了现代文学表现的新领域。沈从文揭露了都市生活的黑暗面,即在现代物欲横流下都市精神的荒芜、道德堕落、人性丧失。这些丧失了生存意义的都市人,与愚昧、麻木、落后的乡村人一样,也表现出中国尼采“末人”的特征。《某夫妇》自诩为绅士的男子胁迫自己的太太出卖色相去引诱别人骗取钱财。《有学问的人》教物理学的绅士是个有学问的人,但是个人道德却低等至极。趁着太太外出,引诱来访的太太的同学。《绅士的太太》中的绅士们所处的所谓上流社会群体,表面上维持着和平有序的家庭关系,背地里却是夫妻间各自寻求作乐。尼采反感于现代人仅仅满足于动物式的生活,而无法体会到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盲目地疯狂地紧紧抓住生命,却无任何其他更高的目的,而且也不知其所以然,这就是动物的生活”。⁶⁷⁾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下,这些所谓的高等人精神空虚、道德堕落,有“生活”而没有“生命”,与动物无别。

在对都市“末人”动物般生活的批判,沈从文进一步提出作为现代文明代表的“都市”弊病。他不无悲伤地感喟:“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伊

67) (德)尼采著,周国平译,《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106页。

然只剩下一个空壳。……生命已被‘时间’‘人事’剥蚀快尽了。”⁶⁸⁾鲁迅的乡村小说中“吃人”和耗费人生命的是封建礼教和道德，而都市中耗尽人生命的是这些“人事”。这是一种可怕的实际主义者们，除了传统道德和礼教、制度，还有金钱和权力、名分的奴隶，“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这与尼采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一致的，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说，“一步步走向颓废——这就是我对近代‘进步’的定义。”⁶⁹⁾结果是文明越发达，人类就越衰弱，自我就越丧失，人的精神和内心就越贫乏。

第二，原始生命力“超人”的开拓。要治愈都市代表的文明社会之病，沈从文认为只有回到原始自然中，发掘原始自然中的生命力，在对生命力的礼赞中推进了尼采“超人”的中国认知。沈从文在表现远离都市的自然小说中，塑造了大批具有原始生命力的人性。《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中的七个“野人”，勇敢如狮子，徒手可以搏野猪。为捍卫苗族人的自由，他们发誓反抗官府，表现出“湘西”男性强力、血性、勇武、阳刚的气度。《雨后》中的四狗和阿姐在山采野菜，雨后初晴的好天气下自然生发男女之情。任凭单纯的情欲自由激荡，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原始活力。《边城》中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翠翠是自然的女儿，她品性纯净脱俗，鲜活的生命力在自然中自由自在地流动着。这些远离城市，生活在边远尚未被儒家礼教熏陶，未被现代文明异化污染的“湘西”土地上的人们，与都市中被现代文明压抑而吞噬了生命力的病态的“末人”形成鲜明的对比，都是具有自然生命力量的“超人”。

沈从文笔下的这些自然力“超人”相对于鲁迅作品中的“狂人”，更具有尼采所推崇的强力意志和酒神精神。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已指出：“现代萎靡不振文化的荒漠，一旦接触酒神的魔力，将会如何突然变化。一阵狂飙席卷一切衰亡、腐朽、残破、凋零的东西。”⁷⁰⁾认为张扬生命力的酒神精神是拯救现代文明堕落的一种出路，这与沈从文是一致的。“酒神精神”的本质在于

68)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3页。

69) (德)尼采著,周国平译,《偶像的黄昏》,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110页。

70) (德)尼采著,周国平译,《尼采美学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67页。

肯定生命，而生命的本质是强力意志，“强力意志”实际上就是酒神精神改造过的“生命意志”，强调自然界中生命丰盈的观点。认为世界不是一个万物求生存消极过程，而是一个万物求生命力扩张的积极过程。沈从文笔下的“超人”们也具有无限扩张的积极的生命力，尽情张扬他们野性的生命强力，和不受现代社会秩序与观念束缚的人性自然与生命自由，传达出对现代社会泯灭人性的批判。

第三，审美和艺术的拓展。鲁迅的“狂人”、“疯子”在反抗旧道德上表现了强力意志，沈从文笔下的“超人”则是在张扬原始生命力上体现了强力意志。这些具有原始生命力的人物，都是在人性美的理想和标准之上。沈从文曾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的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⁷¹⁾沈从文对人性有自己评价的标准和尺度，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尼采对世俗的道德和人性也有自己的判断，“我之否认道德……是不承认其大前提。”⁷²⁾在《神巫之爱》中沈从文让从社会道德来说不能拥有爱情的神巫，毫无禁忌地尽情享受男女之欢乐。《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女人死后，男人将女人的尸体从坟中挖出来放在山洞中，“赤光着身子睡在洞中石床上，地下身上各处散满了蓝色野菊花”。如果用儒道的礼法、秩序和伦理来观照沈从文笔下所呈现的故事和情境，无疑是离经叛道且无法想象的，然而若用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人性标准来观照，则充满了浪漫的传奇美。

除了表现具有生命力的人性，沈从文还塑造了多种多样至纯至善的人性。《边城》里找不到一个“恶人”，无一例外，所有出场人物都是“好人”。他们相互尊重，互帮互助，酒家屠户、往来渡客乐善好施，处处都能使人感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性之美。⁷³⁾这是一个理想的人性的“伊甸园”，所有的人物都

71)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10卷,花城出版社,1984,266页。

72) (德)尼采著,田立年译,《朝霞》,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139页。

73) 高建惠,《沈从文《边城》中的《圣经》原型研究》,《中国学论丛》45辑,2014。

具有神性一样的人性之美，这种至善至美，只在艺术中存在。艺术上对美的追求与沈从文的生命观相关，他认为艺术和审美是生命的形式，主张以文学、绘画、音乐等各种艺术的形式记录生命之美。在〈抽象的抒情〉中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⁷⁴⁾尼采也认为审美和艺术是世界存在的方式，也是生命延续的方式。“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⁷⁵⁾，“艺术作为救苦救难的仙子降临了。唯她能够把生存荒谬可怕的厌世思想转变为使人借以活下去的表象。”⁷⁶⁾

沈从文甚至为了追求艺术的表达而发疯、痴狂。“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痴。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⁷⁷⁾他的小说中有音乐，也有绘画，可以称为一种综合的艺术体。从美术的角度看，沈从文自身的就是一位艺术家，在服装和美术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菜园》中美丽的菜园与善良的主人构成一幅优雅纯净的素描画。《柏子》中从近处的黑暗到远处一盏红色的灯光，最后到全景灯光点点，照亮每个水手心房。再到红光一片，通过颜色和光影的变化，刻画出一副光影流动的彩色印象画。⁷⁸⁾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从音乐的角度看，沈从文认为音乐自身就可以“表现生命纯粹”，尼采也称“音乐本身有完全的主权”。⁷⁹⁾《边城》中长短句，重叠词，平仄对称词和拟声词的使用，不仅使小说散发出诗一般的意境和节奏感，甚至听得到风声、水声，大自然的交响乐。沈从文的小说打破了中国旧式小说和当时鲁迅等欧化新小说在叙事上的固有章

74)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527页。

75) (德)尼采著，周国平译，《尼采美学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06页。

76) (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译林出版社，2014，48页。

77) 沈从文，〈生命〉，《沈从文文集》11卷，花城出版社，1984，295页。

78) 高建惠，〈色彩詞的文学性研究-沈从文小说为中心〉，《中语中文学》77辑，2019，17、20页。

79) (德)尼采著，周国平译，《尼采美学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09页。

法,使小说获得了更多的艺术元素和表现功能。同时可见,沈从文和尼采在生命观、审美和艺术认识上都达到了高度一致。

V. 结论

综上所述,从鲁迅到沈从文,从中心到边缘,我们看到了尼采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被引入、阐释、本土化、传播、不断深入的一个动态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尼采的中国化是在文学领域进行的,其过程与中国文学现代化,即现代文学的发生,以及鲁迅等现代文学作家经典化过程相辅相成。

第二,鲁迅是早期尼采介绍者之一,也是20年代现代新文学中心人物。鲁迅在20年代前半期现代文学界经典化、“中国尼采”形象广泛认知的同时,开拓了“中国尼采”文学表现模式,奠定了中国尼采化的重要基础,深化了第一次“尼采热”对尼采的理解。

第三,沈从文在20年代后半期,延续鲁迅奠定的中国尼采模式,在时代“共识”——救亡和启蒙的“功利”认识上接受了尼采,同时又进一步在艺术审美和生命观上发展、推动了尼采中国化的进程,确立了“中国尼采”的新模式。

第四,学界普遍认为1925年以后,尼采热在中国退潮。但从沈从文对尼采艺术和审美的接受来看,“退潮”实际上是被功利性接受的“尼采”文化符号的一种转向。“功利性”逐渐褪去,艺术和审美的“尼采”逐渐被中国所接受。在生命意识、文学艺术审美思想上,尼采在中国不仅没有“退潮”,反而在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中得到延续,尼采中国化的影响不断扩大和深入。

当然,尼采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同时,这一课题涉及到众多的作家作品,表现比较复杂。比如说与沈从文同时期“战国策”派文人们也积极宣扬尼采的思想,但与沈从文又有所不同。20年代处于“边缘”的沈从文,到30年代逐渐成为新的文学经典人物,⁸⁰周

围开始围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尼采对这些人又有怎样的影响？还有，作为经典的现代文学作家，其思想都是多重复杂的，尼采中国化过程的尼采思想与其他现代思想的关系和作用是怎样的？等等，都将作为后续课题留待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 고건혜, 〈중국현대문학에서의 니체 수용 연구-현대성과 현대문학의 탄생에 중심으로〉, 《니체연구》, 2020.
- (德)尼采著, 黄明嘉译,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漓江出版社, 2000.
- (德)尼采著, 周国平译, 《尼采美学文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费冬梅, 〈沈从文: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4.
- 黄怀军, 〈化用与背离:沈从文对尼采的处置〉, 《中国文学研究》, 2016.
- 黄怀军, 《中国现代作家与尼采》, 四川大学博士论文, 2007.
- 高建惠, 〈色彩詞的文学性研究〉, 《中语中文学》, 2019.
- 高建惠, 〈《边城》与《城堡》文本含混性对比研究〉, 《中国语文学》, 2016.
- 鲁迅,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 李林荣, 〈鲁迅“尼采”的踪迹及意蕴〉, 《山东社会科学》, 2013.
- 李宗刚, 〈《新青年》编辑约稿与鲁迅现代小说的诞生〉,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17.
- 闵抗生, 〈《狂人日记》中尼采的声音〉, 《鲁迅研究动态》, 1986.
- 闵抗生, 〈《墓碣文》与《Also Sprach Zarathustra》〉, 《扬州师院学报》, 1989.
-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 1984.

80) 费冬梅, 〈沈从文: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11期, 2014.

- 杨联芬,〈晚清与五四文学的国民性焦虑(三)〉,《鲁迅研究月刊》,2003。
- (日)伊藤虎丸,〈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文学评论》,1990。
- (日)伊藤虎丸著,孙猛译,《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张钰,《重回历史现场-从接受视角重新认识《狂人日记》》,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 左轶凡,《作为燃料的青春及其表达-《新青年》杂志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 (澳)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Abstract >

Nietzsche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s a writer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he had a greater influence in the literary world than in the philosophical world. Lu Xun was a pioneer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 crucial figure in the process of Nietzsche's sinicization. He is known as "China's Nietzsche". In the 1920s, Lu Xun had become the center of the literary world. The canonization of Lu Xun in the literary world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Nietzsche were a complementary process. At this time, Shen Congwen, another classic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ppeared in the literary world, but he was only a marginal figure. With the gradual canonization of Shen Congwen, he opened up a new realm of "Lu Xun's Nietzsch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20s and deepened Nietzsche's influence in China.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after 1925, Nietzsche's upsurge in China has ebbed,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en Congwen's acceptance of Nietzsche's art and aesthetics, Nietzsche not only did not "ebb" in literary and artistic

aesthetics, but was continued and deepene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鲁迅(Lu Xun), 沈从文(Shen Congwen), 接受(Acceptance),
经典化(Canonization), 中国化(Sinicization), 中心和边缘
(Center and Edge).